

论从周刊

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

□ 孙占元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责任和使命所在，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善于选用干部和从严管理干部，以持续改进作风为切入点，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全党一起动手，把管党治党的责任真正落到实处、不断引向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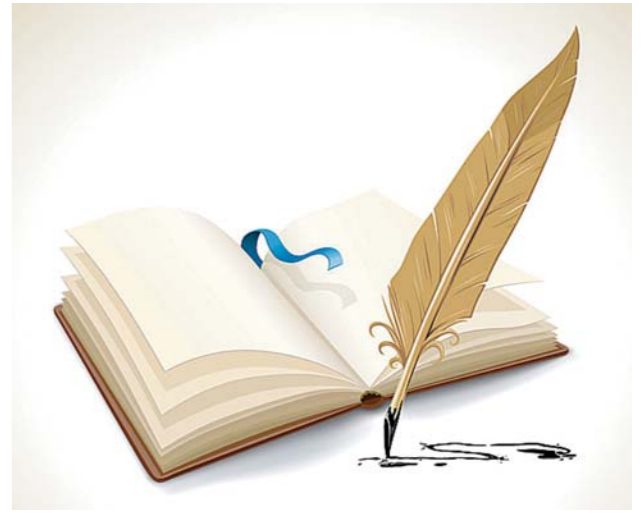
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注重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在管党治党过程中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坚持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就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的新思想，在准则和条例中得以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加强党内监督以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的有效执行等重要原则，为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制度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善于选用干部和从严管理干部。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赋予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用干部条件以新的时代内涵，对于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具有导向作用。十八届六中全会将这些条件和标准融合起来，强调必须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规范程序，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使选人用人之风纯洁起来。从严治吏，就要坚持对干部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使各级干部自觉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当然，还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鼓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

全面从严治党，要以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为切入点。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坚决纠正长期存在且难以解决的不正之风，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端正党风政风的切入点。从2012年12月中央

政治局从自身做起制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反对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种种措施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党的作风持续向好。然而，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必须经常抓、深入抓，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分析的那样：“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同时，要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作为突破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如何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怎样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两大抓手。一是以严、紧、硬的态度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重拳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又着力解决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新成效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众给予高度评



为何要“以德为先”

□ 马清伟

只有“为政以德”，才能“导民以德”，才能实现“以德治国”，最大发挥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为何要“以德取人”的完整逻辑链条。

每到换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一选干标准，就会被组织部门庄而重之地再三强调。为什么是“以德为先”，而不是以其他的一些标准为先，比如才能、考试、名声、家族，甚至相貌？要知道，相貌在古代也是选拔官员的一大标准。史书记载，雍正最爱“以貌取人”。金庸的祖先查嗣庭就因为长了一副“狼顾之相”，被雍正所厌恶。因此，直到今天，金庸都特别恨雍正。

古往今来，选拔官员的标准很多，为什么只有“德”成为一以贯之的最高标准？著名学者阎步克教授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曾对贯穿汉朝历史的五种选官制度：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以名取人、以族取人，进行过分析。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有所体悟。

汉武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成熟的选官制度，即察举制。察举的最主要科目是“孝廉”，很明显，这是一个关于道德的标准。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第一个选官制度，就是贯彻“以德为先”标准的。

阎教授是这样论述汉朝察举制中的“以德为先”标准的：选官中“以德取人”，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意味着对儒家为政以德、导民以德的德政和教化思想的认同和维护。同时从社会分化角度看，儒家之“以德取人”，体现了一种对人格美德、家族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不作明确区分，对个体人生、社会-生活、文化活动和政府行政不作明确区分，甚至还有意识地使之以某种精致的方式互相混淆、互相渗透起来的思想特色。

只有“为政以德”，才能“导民以德”，才能实现“以德治国”，最大发挥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为何要“以德取人”的完整逻辑链条。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推行“以德治国”，只靠法律不行吗？答案是不行，在汉武帝之前没多久，只靠法律治国的秦朝二世而亡。这教训实在太深刻了，近在眼前啊！法律只能提供社会约束的刚性力量，我们还需要一种柔性力量，来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一种“软约束”。西方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人家都有宗教约束——可我们没有。还好儒家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工具——道德约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因此，那种认为道德只是私人领域的小事，不应该在政治这种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观点，可以打住了。中国的独特历史传统决定了，政德影响民德，政府影响社会，政风影响民风。为官者在各个层面都要作表率，也就是阎教授所说的“人格美德、家族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不作明确区分。”

但道德水平高不一定就意味着行政能力强，所以在“以德为先”的前提下，还需要“有才”，看这个人能不能干。汉朝统治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后来又发展出了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的选官标准：

光武帝下诏，州郡察举茂才、孝廉，“务授试以职”。即做官是必须有试用期的，这体现了“以能取人”。那么，试用期多长呢？刘秀的制度是一年，后期的制度是10年。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正式入职前的试用期，先看你这个人能不能干，不符合职位要求。

但试用期毕竟不是正式制度，所以就很快发展出了“以文取人”：

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对这一因素，我们可以称为“以文取人”。

说白了，就是考试。汉朝的“以文取人”，后来就发展成了隋唐以至明清的科举考试制度，包括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凡进必考”。这些都体现了以才华、能力为指向的考核标准。

道德、才干，从此成为历代王朝选拔官吏的两大标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德才兼备”。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比较奇葩的选人标准，比如上面所说的“以貌取人”（长得帅），“以艺取人”（徽宗高俅之流），但那都属于极权者的个人喜好，算不上主流标准和正规制度。

算上主流标准和正规制度，“以德为先”也不能走向极端化和表面化，那样就会导致“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

汉朝末年，君子人格要更多地求助于社会评价；而在汉末巴由士林所支配的舆论之中，“名士”被认为具有最完美的人格与最高尚的德行。对士人来说，重“德”必然联系着重“名”。

东汉以来的一个重要社会变动是，许多衣冠世家日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官位、族姓与文化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至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一类世代公卿、世代传经又世出名士的家族……这意味着“士”与“族”的结合，或说知识分子官僚与家族关系的结合，可能形成一种在发展中最少受阻，并在选官中得到最大优惠的政治势力。

道德标准被推向极致，必然会出现一些矫饰以求取道德名声的虚伪之徒。正如今天官场有很多“两面派”一样，古代同样缺少沽名钓誉的伪名士。对此，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完善考察标准，确保选出来的是真正的有德之士。同时，我们也要避免“以族取人”，绝不能让德才标准的评判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萝卜招聘和权力世袭。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 檬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 田建国

做真人”。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传授。但现行教育过于知识化，一味重视专业教育，过于强调专业训练、职业导向，而忽视了道德成人、精神成人，德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我国古代对大学本质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话表明了大学的三重本质：明明德，就是大学的第一要义是培养学生光明的德行；亲民，就是大学要培养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要为民造福；止于至善，善是最高境界，大学不管是培养学生的德行还是为民造福，都要努力追求最高境界。

当前，立德树人的教育核心是坚定理想信念。理想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理想，就像一盘散沙。如何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关键是在教育内容中突出社会责任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现代公民教育。

社会责任教育。责任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方式，是职业角色的基本表征、社会认同的主要依据和价值实践的集中体现。责任是人的最宝贵的品格，是一切道德的基础。面对国家没有责任，就没有尽忠之心；面对长辈没有责任，就没有尽孝之心；面对自己没有责任，就没有进取之心。责任是一切动力的源泉，责任出精神、出力量、出勇气。人的每一项潜能，都因为有责任驱动才变得更强大。责任是一种精神境界，平凡中有伟大追求，平静中有满腔热血，平常中有强烈的责任感。责任胜于能力，责任激发潜能，责任体现忠



诚，责任成就卓越。责任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你付出了什么；责任不是智商和学历，而是良知和品格。

民族精神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教育青年学生，就既要具有世界眼光，同时也要充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既懂得保持本民族价值规范体系，又要融入世界优秀文化中。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根脉，时代精神、外来文化都要嫁接在这棵大树上才能成活。

现代公民教育。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培养科学家、学者，而是培养现代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简单传授知识，而是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包括对世界的态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现代公民，要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现代公民素质包括：对社会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国家具有责任感；对他人富有爱心；遵守社会准则。现代公民教育，首先要抓好基本的公民道德修养，学会承担责任，讲诚信、懂感恩、报恩，善于团结合作。要成为好的接班人，首先要成为好的建设者；而要成为好的建设者，首先要成为好的公民。

（作者系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论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以党风政风的新变化和 new 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必须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责任和使命所在。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所在。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完成历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只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才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在党的建设“五位一体”布局中，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一以贯之的传统，把制度建设贯彻其中是改革开放以来又一经验总结。十八届六中全会突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的思想，这就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坚持制度治党，就要健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注重党内法规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关键是在教育内容中突出社会责任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现代公民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我们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办学思想，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立德”是我国古代三不朽之一，把立德摆在第一位，就是指“万事从做人开始”。《管子》中提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说明培养人才是长远之计。由此，“立德树人”成为我国历代教育所共同遵循的基本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是树人的前提和基础，树人是立德的目标和追求。德不可能自然形成而要立，人不可能自发成才而需要树。立德是为了树人，而树人更需要立德。立德树人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抓住立德树人这个根本，实际上就抓住了教育的本质特征。

教育的根本使命，是陶冶人性，铸造健康饱满的人格；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康德说，“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为人”。人靠教育而存在，教育为人而存在。陶行知则说，教师的职责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责是：“千学万学，学